

#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周一平

毛泽东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了多项农村调查。这些农村调查的成果,在三、四十年代有一部分遗失了,发表的也不多,基本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流行。直到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才比较全地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保存下来的成果,并且向全国、全世界发行。从而使人们能看到毛泽东在社会学,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学方面也硕果累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拓者、建设者之一。

## 一、抓住了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革命

毛泽东早年受到过严复、梁启超等介绍的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但当他的世界观完成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以后,他所从事的社会调查,就不是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思想理论指导的,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指导的。如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的:“有计划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sup>①</sup>。又说:一定要把握住“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的观点”<sup>②</sup>。正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所以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问题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独特的中国社会学思想理论。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问题理论,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他认为,二、三十年代中国首要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而要完成革命任务,需要有正确斗争策略。正确策略的制定,“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sup>③</sup>。“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sup>④</sup>。而了解社会实际,首先要搞清楚社会结构中阶级结构情况。毛泽东强调:“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sup>⑤</sup>。毛泽东正是通过社会调查,作出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解决了革命的主力、同盟者、对象等问题。也正是在社会调查基础上,他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问题。这就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最重大问题,表明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最深刻认识。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学,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是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

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毛泽东要研究、解决的中国社会问题，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经院社会学者不研究，也解决不了的。毛泽东研究、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学，是不能用西方及经院社会学理论来规范的。

## 二、建立了中国农村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

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农村的调查是较深入、全面的，不仅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中国农村社会学建构了某些理论框架。

1. 关于农村社会的结构，毛泽东调查、研究最多的是农村阶级结构。如《长冈乡调查》第一节《政治区划及户口》谈到：全乡 437 家，1785 人，当红军、做工作 320 人，在乡 1465 人。其中中农、贫农 1286 人，工人、雇农、苦力 102 人，地主 2 家 5 人，富农 11 家 72 人<sup>⑥</sup>。毛泽东不仅搞清各个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将每一个阶级内部的构成搞得清清楚楚。如《寻乌调查》把地主分为公共地主、个人地主两部分。公共地主由祖宗地主、神道地主、政治地主构成。个人地主由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构成。公共地主土地占全县土地 40%，其中 60% 土地为祖宗地主所占，神道地主、政治地主各占 20%。个人地主土地占全县 30%，其中以小地主占地最多，中地主次之，大地主最少。人口比例，大地主占全县人口的 0.045%，中地主 4%，小地主中破落户占 1%，新发户占 2%<sup>⑦</sup>。搞清农村阶级结构状况，是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政策、策略的基础，也是农村社会学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并为农村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人口结构等的调查研究建立了基础。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结构的定量调查研究，也为定性分析建立了基础。如毛泽东在列出了寻乌县城人口阶级结构的统计数字以后便指出：“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份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sup>⑧</sup>。

2. 关于农村经济，毛泽东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结构，对农、林、牧、副、渔的结构，对交通、物价等均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其中调查研究较多的是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方式以及分田、苏维埃政府如何组织生产等。如《寻乌调查》中有《剥削状况》一节，把剥削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三类分别调查研究。指出地租剥削的形式有见面分割制、量租制、批田、谷纳、钱纳、铁租、非铁租、劳役、土地买卖等。高利剥削的形式有钱利、谷利、油利、卖妻鬻子、打会等。税捐剥削形式有钱粮、烟酒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牛捐、赌博捐、派款、借款等<sup>⑨</sup>。《兴国调查》中也有《剥削状况》一节。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土地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立的基础，也是农村社会学应研究的重要问题。

《寻乌调查》中《寻乌的土地斗争》章、《兴国调查》中《现在土地分配状况》章，是对农村土地革命展开、分田等情况的专门调查研究。其中涉及社会问题很多，如分田就涉及山林、池塘、房屋等。分地，也涉及到以区为单位还是以乡村为单位分？按人口平均分还是按劳力分？游民、僧道、娼妓分不分？工人分不分？快分还是慢分？分地后即刻过耕还是秋后过耕？肥田、瘦田如何分？分得田以后无劳力耕种怎么办？出现荒田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均作了调查研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长冈乡调查》中《合作社运动》等章对农村生产组织情况作了专门调查研究。毛泽东对当时农村中出现的“模范耕田队”、“劳动互助社”进行了赞扬、宣传，指出：“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sup>⑩</sup>。毛泽东对当时农村出现的“耕牛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进行了宣传，希望各地仿行。这些调查研究不仅是生产组织的调查

研究，也是社团性、群体性组织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对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所以较关注以上这些问题，是当时民主革命性质任务决定的，是指导农村经济工作的需要决定的。这些问题无疑也是当时农村社会经济中的大问题。

3. 农村政治在当时包罗广泛，如分田、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当时农村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再如武装斗争，是农村军事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农村政治的内容，毛泽东都很关注，而调查研究较多的是农村红色政权的建设、农村政治组织、团体的建立、活动等。如《兴国调查》中有《苏维埃》一章，分别调查研究了苏维埃区政府、乡政府、村政府的组成及人员情况：指出了政府人员的官僚主义、调子女到政府办事、强奸民意等弊病。所以产生这些弊病，“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份不好，将来都要改变的”<sup>⑩</sup>。《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都有《乡苏下的委员会》章，即调查研究乡及村苏维埃下设的各个委员会的组成、流动情况。这些委员会名目很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拥护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有财产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劳动委员会、逃兵归队委员会等，有的是常设的，有的是临时性的，各地均根据实际需要增减。这些委员会既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又是群众团体组织。毛泽东指出，这些委员会的设立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创造”。此外还可以设更多的委员会，如户口、粮食、工农检察、赤色戒严委员会等<sup>⑪</sup>。毛泽东对农村基层权力机构的组成、人员等情况，如乡代表会议的组成、开会、代表选举，代表政治表现等，也作了调查研究，并从中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sup>⑫</sup>。对贫农团、宣传队、突击队、反帝拥苏同盟等政治性群众组织的组成、活动，也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如《长冈乡调查》中这些组织都设有专章，其中谈到了苏维埃应负起领导贫农团的责任等<sup>⑬</sup>。谈到反帝拥苏同盟，乡和村都有委员会，下设小组，交盟费，但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所以7岁以上的人只有30%晓得“反帝”、“拥苏”的大意，应进一步做好工作<sup>⑭</sup>。以上这些政治组织的研究，既是农村社会政治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组织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管理、控制，主要是政治的管理、控制，通过政治组织来实施。

4. 农村军事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革命根据地所以能产生、发展，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了武装斗争。在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活动，成为农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革命根据地的劳动群众，除老幼外，几乎人人皆兵，这与非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有很大不同。国统区的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研究农村社会军事，而毛泽东调查研究之，除了一些主观原因以外，客观对象不同，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调查研究农村军事，主要对象是农村的群众性军事组织的构成、活动，而不是正规红军，不是从军事学角度去调查研究，这样就显出了农村社会学的特色。如《兴国调查》有《农村军事化》章，分七节：一、赤卫队；二、少年先锋队；三、童子团；四、纠察队；五、红军预备队；六、区特务营；七、红军独立团。这些都是农村的群众性军事组织，或者说都是“民兵”组织，不是正规红军。《长冈乡调查》中《地方部队》一章也是谈“民兵”组织。其中谈到童子团（亦称劳动童子团，简称童团）如何放哨（白天童团放哨，晚上赤卫队放哨）、查烟赌、破除迷信打菩萨等，并参加民众大会。童团查烟赌打菩萨根厉害，完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sup>⑮</sup>。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强调：“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sup>⑯</sup>。这也可见毛泽东重视农村军事调查的原因。

5. 农村文化，广义的讲可以包罗农村社会生活的一切，狭义的讲可以只指农村的文化生活。民主革命时期，建设农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红色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重视农村文化的调查是自然的。《寻乌调查》中《寻乌的文化》一节、《长冈乡调查》中《文化运动》、《卫生运动》等章，《才溪乡调查》中《文化教育》章等都是农村文化调查研究的成果。其中，有农村人口文化结构的调查，指出有60%的人不识字，40%识字人绝大多数是识二百字至高小文化程度（见《寻乌的文化》）。有红色政权办小学的调查，指出办起的小学校都是初小，高小因无经费、教员，还没办起来（见《寻乌的文化》）。有文化运动的调查，谈到各乡村办夜学、识字班、俱乐部，有的还组织了读报团（才溪乡）各村都设识字牌。从中可以看到，农村的文化程度很低，文化教育、活动的组织、设施很简陋，但作用不小，农村文化建设的任务很重。毛泽东还调查研究了农村文化生活、社会习俗的变化、发展，如破除迷信等。这些内容，既是农村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社会变迁、进步的组成部分了。

6. 婚姻、家庭、妇女，是全社会的热门话题，也是农村社会研究的热门题目。毛泽东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也很关注这些问题。《兴国调查》的第一章便是《八个家庭的观察》、《长冈乡调查》中有《妇女》一章，《寻乌调查》中有《土地斗争中的妇女》一节，都是调查研究农村婚姻、家庭、妇女的成果。毛泽东谈到：妇女在农业生产中与男子一样是主力，但她们是男子经济的附属品，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土地革命开展后，妇女逐渐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自由实现了。特别突出的是离婚案大量增加，十件离婚案有九件是妇女提出的。而成年农民男子虽主张结婚自由，却反对离婚自由，主要因为一离婚就少了劳动力<sup>⑤</sup>。同时，买卖婚姻仍在，如童养媳仍存在。《兴国调查》谈到钟得五家庭的九岁侄儿讨了个九岁的老婆，便是童养媳<sup>⑥</sup>。《寻乌调查》谈到县城的一个盐行店主钟周瑞买了个五岁的“等郎嫂”（郎还未生下来，故等之），也是童养媳<sup>⑦</sup>。这表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以爱情和经济条件两者为基础的婚姻都存在着。

在革命根据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实现，除各方面的促进作用外，有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就是乡、村妇女组织的建立。《长冈乡调查》中《妇女》一章，就介绍了劳动妇女组织——“女工农妇代表会”的组成、活动情况。高度评价了这一妇女组织：“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中，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姿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毛泽东要求“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sup>⑧</sup>

《兴国调查》中调查的家庭，从家庭成员数量来说，最少为4人，最多为11人，平均6.6人；从家庭结构类型来看，主要是主干家庭、联合家庭，而没有核心家庭、独居家庭。《寻乌调查》中，还谈到了一些结不起婚的人，如理发匠十个有八个没老婆，他们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sup>⑨</sup>。这类人是不组织家庭。毛泽东认为农村家庭的调查研究很重要，“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sup>⑩</sup>。这种调查对中国革命有意义，对农村社会学也是这样。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群体，家庭涉及的社会问题是众多的。

7. 农村社会变化情况怎样，变化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这是农村社会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关注的问题。毛泽东对农村社会变化的调查研究较注重经济、政治因素。如《寻乌调查》中谈到传统铁业、纸伞业的衰落，洋铁业、洋伞业的兴盛，强调的是

经济原因。谈到绸缎业（因科举废止，清朝灭亡）、爆竹业（因破除迷信等）衰落，谈到根据地物价的降低等，强调的是政治因素<sup>⑧</sup>。至于谈到服饰变化，由“大襟装”到“破胸装”，谈到“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sup>⑨</sup>就不仅强调了政治因素，也强调了文化因素。以上这些社会变化及社会进步，实际上也涉及到了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的某些变化。

8. 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还涉及农村社会学的其他许多内容：如农村生活方式，《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中的《剥削状况》反映了农村的剥削方式；《长冈乡调查》中的《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合作社运动》等，反映了农村劳动方式；《长冈乡调查》中的《群众生活》、《才溪乡调查》中的《日常生活》等反映了农村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兴国调查》中的《八个家庭的观察》等反映了农村家庭生活方式……再如农村劳动就业，农村社会工作，社会救济工作和社会教化工作等很多问题都有调查、研究。

以上说明，毛泽东对农村的调查研究，已涉及到了农村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为如何研究这些问题作了示范，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农村社会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农村社会学的某些理论体系、框架。可以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文集》标志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学萌芽了或产生了。这应视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的贡献之一。

### 三、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查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在社会调查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及基本原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之点有：

1.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自然应该停止你的发言权<sup>⑩</sup>。这里提出的是研究任何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任何研究。都必须先调查，先搜集资料，然后才能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有发言权。只有有了调查的“十月怀胎”，才能有解决问题的“一朝分娩”。

2. 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之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sup>⑪</sup>。不能先有结论再去调查，不能带着框框去调查，否则就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就不是科学的调查。这是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现代社会学强调的社会调查要不“唯己”，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现代社会学的“价值中立”原则，强调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干扰，即与此相类似。

3. 要深入调查。要详尽地了解一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sup>⑫</sup>。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sup>⑬</sup>。不深入就不可能得到详尽、确实的材料。而调查的任务就是要得到详尽、确实的材料，材料要搜集得愈多愈好。

4. 抓要点。调查一定要搜集主要材料。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认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sup>⑭</sup>。在详细占有材料之后，仍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sup>⑮</sup>。抓要点是辩证法观点的体现。而要注意的是，这个“要点”是客观形成的，不是主观想象的。

5. 抓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sup>⑥</sup>。毛泽东提倡的典型调查是双重典型调查，先把调查对象分成不同类型，然后再在不同类型中分不同类型进行调查，即双重分类调查。先进、中间、落后的三类中，不是每类只选择其中的一个对象进行调查，而是每类选择两、三个对象进行调查。这样就可以比较多地克服典型调查的局限性，达到通过典型调查“可知一般的情形”的目的。双重典型调查，是深入调查的方法，是抓矛盾主导方面的调查方法，是辩证法观点的某些体现。典型调查，经过毛泽东的示范、倡导，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的重要方法。但要注意的是对象的典型性、代表性必须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调查时，不要忽视定量的调查、研究。同时要注意正确评价典型调查的结论，不能用典型调查的结论来否定普遍调查的结论。

6. 调查要不断进行。“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的知识”<sup>⑦</sup>。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调查必须随之不断进行，一劳永逸的调查是不存在的，不能停留在一次调查的结论上，不能只作一次调查就止步不前享用一辈子，否则就落伍，就没有发言权。不断进行调查是辩证法的观点体现。

7. 调查要耐心、有步骤地进行。“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sup>⑧</sup>“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sup>⑨</sup>。耐心，就是不要急于求成，要有长期调查的准备。有步骤，就是有计划、有组织、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调查，从而高效率地，完成调查任务，达到调查目的。

8. 开调查会。这是毛泽东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毛泽东认为：向社会作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sup>⑩</sup>。外国的社会学者认为调查、访问最好一对一，调查和被调查者单独进行，有第三者参加会带来很多不方便；认为要获得真实的初级情报最好采用无记名访问方法（详见前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手册》）。为什么毛泽东采用多人参加的、记名的调查会方法却效果特别好呢？毛泽东做到以下几条：（一）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要把请来开调查会的人当作“可敬爱的先生”，“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sup>⑪</sup>。（二）做群众的好朋友。毛泽东说：“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有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sup>⑫</sup>。（三）讨论式。“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

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sup>①</sup>。(四)要请有关的各方面人参加。“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sup>②</sup>。即是说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以利得到较全面材料，更多地克服片面性。(五)到会人数一般在三人以上。调查者有指挥能力，可以请十几个或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sup>③</sup>。如毛泽东的兴国调查，就是找了八个人开调查会，“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sup>④</sup>。(六)事必躬亲。调查要亲自出马，不要委托他人，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开调查会，“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sup>⑤</sup>。这有利于获得确实的第一手材料。(七)事先定好调查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出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sup>⑥</sup>。这即是现代社会学所谓的设计调查提纲，设计调查方案。正因为毛泽东有正确的理论、态度、方法，有充分的各方面的准备，所以调查会开得卓有成效、活泼有趣，到会者参加一星期(兴国调查)甚至十多天(寻乌调查)的会，甚至每天开两次、三次会，有时开至夜深，也不觉得疲倦<sup>⑦</sup>。

毛泽东社会调查原则和方法的理论，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在理论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调查研究都有指导意义。这得到大多数学者承认<sup>⑧</sup>。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情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理论。特别是典型调查、开调查会的理论，与国外社会学者的理论有某些不同。国外学者多重抽样调查，有所谓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等距抽样等，不重典型调查。也不太重视开调查会，所谓集体访谈式的“头脑风暴法”、“反向头脑风暴法”，任务不是调查社会情况，而是征询新点子或批评旧点子。这不能否定毛泽东理论的正确性，只能说明毛泽东理论的中国特色。毛泽东的成功，证明他的理论是行之有效的，现代社会很多调查实例(如中央为制定方针政策进行的调查研究等)也证明毛泽东的理论行之有效，有普遍指导意义。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理论也会不断发展。电话、电脑、录音、录像、传真等技术的利用，无疑将使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发扬。

(责任编辑 濮侃)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24页、8页、182~183页、5~6页、288页、106~131页、99页、136~159页、311~312页、245~246页、300页、289~293页、329页、327~328页、248~249页、303~304页、177~181页、192页、

58~59页、325~326页、89页、183页、187页、80~81页、1页、2页、10页、24页、25页、25页、27页、21页、21页、23页、16页、16~17页、27页、9页、9页、9~10页、183页、10~11页、10页、183页。

⑧详见水延凯等《社会调查教程》第二章第四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韩明汉《中国社会学史》第五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